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七年第二期 总第16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 01 中国转型要扩大中产阶级力量
- 02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真正的“千年大计”

聚焦中三角

- 06 武汉去年专利申请破4万件 同比增三成
- 07 中部省份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探索改革

- 10 中国供给侧改革药方对吗
- 13 国企新常态下的制造业转型创新

经济广角

- 15 中国经济反弹强劲 货币政策转向收紧
- 17 中国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科教文卫

- 20 《侨报》专访：“中国航天的脚步不会停歇”
- 24 鼓励社会办医要做好“加减法”

三农问题

- 25 2.8亿农民工命运仍系于改革
- 27 成都发布重大土地改革政策：商品房用地一律拍卖出让

社会观察

- 28 知识付费时代真的来了？
- 32 大城市限制人口规模就能解决问题吗？

综合治理

- 34 净化政治生态要抓住“关键少数”
- 35 中国监管层治理金融乱象难游刃有余

环球视野

- 37 美挑起减税战扰乱全球经济
- 38 环绕世界的“一带一路”战略

学术前沿

- 41 解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42 专家热议“一带一路”峰会

讯息快递

孝感图书馆

中国转型要扩大中产阶级力量

伍敬斌《香港商报》2017年4月18日

昨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做了题为“中国改革现状与未来”的演讲。他表示，中国在现阶段主抓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路线符合历史规律，但近年来社会建设进步并不大，中产阶级的数量不足，难以支撑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中国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中产阶级的力量。

坚持发展经济不动摇

郑永年表示，当下，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改，是合理的。任何一个国家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说，改革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先生产、再分配、再民主。当经济没有发展到足够程度的时候，人民不会理性思考，容易被表面利益所蒙蔽，制度框架根本立不起来。所以，中国的政治在这个历史阶段像欧美一样开放政治，是不可取的，因为中国的人均 GDP 并没有达到足以支撑开放政治的程度。

郑永年说：“如果只把民主看成选票的话，实际上就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 GDP 一万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 GDP 一千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 GDP 一万美金的社会，它的行为与人均 GDP 一千美金的社会行为完全不一样。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就可以搞定。但一个人一旦达到中产阶级水平，其投票的行为就不一样了，首先小恩小惠收买不了一个中产阶级。”

需增加中产阶级数量

郑永年认为，比起经济改革，中国的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大。而中国社会建设应该是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未来的改革会不会成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到 75%，而中国经济增长 40 多年，增长率高过四小龙，但中产阶级还不到 25%，这说明社会存在很大问题，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

另外，中国人的仇富仇官心态，就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而造成的，这也属于社会建设的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成“房奴”，生了孩子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倾家荡产。在欧洲，社会保障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有住房，在中国，这些东西就是做不好。仅就住房来说，据测算，如不增加房子，目前房地产的存量仍能保证每一个城市居民拥有 40 多平米的住宅。那么为什么现在仍然要大建商品房，不做保障房呢？

郑永年表示，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房价暴涨，十分不正常，应该要做一个分散化的、城市化的道路。他认为，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一线城市集中，导致了在大城市

做医疗改革困难极大。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看病，因为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教授都在北京，即使北京现在要将外来人口“赶走”，过一段时间他们还会来。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德国是80%的人居住在200万以下的小城镇。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中国则相反，且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出性已不可避免。

反腐重点转为拍苍蝇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思路还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一个是反腐，第二是顶层设计。一方面建立法治，一方面要深化经济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一个个“大老虎”的倒台，有人抱怨这是“选择性反腐”、“运动式反腐”。但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反腐仍然很重要。

郑永年表示，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老虎”在政治学里面叫政治寡头，如果现在不反，让这些人继续存在下去，让他们形成利益链条固化后，那就很难再反了，中国很快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今天的乌克兰。目前，反寡头的斗争已基本完成，现阶段如果还有一些“大老虎”的落马，舆论的反映已不太热烈。从政治功效上讲，目前“拍苍蝇”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中国现在走到哪里都是“霸”，校霸、村霸、水霸、电霸等等，什么都是“霸”，非常影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整治。另外，郑永年还认为，反腐造成的官员懒政问题，已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经济要改革，改革就要做事，会触犯很多人的利益。这就凸显了中国反腐的一点缺陷，就是鼓励互相举报，但是互相举报大家是非常心寒的一件事情。因为同事之间互相举报，所以很多官员都选择“软着陆”，就是什么也不做，不做不犯错。这说明反腐的制度建设做得还不够。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真正的“千年大计”

李海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5月9日

资本市场每天的主题、故事层出不穷，但若论这个春天A股最重要的故事，非“雄安”莫属，地处中国河北省腹地的三个小县城已经搅动了资本市场的一池春水，包括冀东水泥、华夏幸福、唐山港等在内的“雄安”概念股接连疯涨，一度成为市场中最强势的板块。

那么雄安新区到底是什么？4月1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通知对雄安新区的定位有三点：第一点，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一条重点强调了雄安新区的战略高度，体现了中国本届高层对于雄安的重视程度。更重要的是后两点，通知指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正是这两点定位使得资本市场近乎疯狂地追逐雄安概念的上市公司。

首先分析第二点定位，其实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经济特区”和“新区”。事实上，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要办“出口特区”之后，中国政府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立了经济特区，此后1988年在海南设立经济特区，2010年和2014年分别在新疆的喀什和霍尔果斯设立经济特区，目前“经济特区”共有7个。而“新区”就更多，自1992年浦东新区设立以来，中国先后设立了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19个国家级新区。

但事实上，从政策效果来看，并不是所有的“经济特区”和“国家新区”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以成立较早的5个经济特区为例，事实上从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看，只有深圳是这些经济特区中的佼佼者。深圳从改革开放前的小渔村，经过37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中国绝对意义上的一线城市。在这37年中，深圳特区的年均GDP增速是28.7%，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3%。而在4月1日发布设立雄安新区消息的同一天，河北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会，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宣布中央决定，许勤任河北省委副书记，提名省长人选，而许勤此前的职务是深圳市委书记。借助“深圳经验”，又是同一操盘手，似乎雄安真的有可能创造下一个“深圳奇迹”，而这也正是外界对雄安寄予如此高期望的主要原因。

而浦东新区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巨变，25年前的浦东新区，多数地区都还是荒郊，上海本地也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但在1992年设立新区之后，浦东经历了一轮经济大发展，25年经济发展复合增速达到14.4%，陆家嘴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绝对意义上的金融中心，甚至以金融业在GDP中占比计，浦东新区已经可以和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比肩。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后，在金融改革持续深化改革，例如2015年10月监管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发布的“金改40条”，浦东新区有望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龙头持续领跑。

对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成功，区位优势是不得不谈及的因素。深圳和上海都是沿海城市，拥有适合贸易的深水港和大型河流的出海口，而同时也分别有珠三角和长三角作为广阔的经济腹地。然而相比深圳和浦东，雄安在区位上存在明显劣势，地处内陆，而中国北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均衡程度也难以和长三角、珠三角比肩。

但从过往发展经验看，区位优势并不是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从五个早年的经济特区看，厦门、珠海、汕头、海南等地在区位优势上都不比深圳弱太多，距离香港、台湾等地区距离不远，也处于泛珠三角经济带。但从实际结果上看，这四个经济特区都没能复制深圳的传奇。事实上，政策红利才是深圳和浦东作为“新区”、“特区”能够崛起的真正核心原因。以深圳为例，持续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才是推动深圳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源动力。

人才政策的改革创新即是一例。同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深圳本身高等教育环节较为薄弱，为吸引人才，深圳于2010年10月开始实施“孔雀计划”，对于纳入该计

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府给予80-150万元的奖励补贴，对于引进的世界一流团队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专项资助。虽然深圳也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样，近年房价飞涨，但政府推出人才安居工程解决高端人才的后顾之忧，根据规划，深圳将在“十三五”期间新建设不少于30万套人才住房，仅2017年就有近6万套计划开工。正是深圳市政府在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上的大力支持，才让深圳持续人口净流入，为特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而持续不断的金融改革同样为深圳的发展蓄力。相比拥有包括大量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距离监管更近的北京和事实上开放更早、更加洋派、外资机构云集的上海，深圳本土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则更加“草根”和励志，可以说，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平安保险等一批深圳本土金融机构的创业史就是深圳的金融改革创新史。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传统“老经济”占比不断下降，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也开始逐步被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新经济”企业所超越，深圳在中国金融版图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近年来，前海等“特区中的特区”更是为深圳的金融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因此从这一点看，由三个中国北方小县城组成的未来的“雄安新区”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劣势，而从临近中国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理位置上讲，雄安新区在政治资源上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能够大胆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相比深圳、浦东，雄安甚至更具看点。

回过头来看对于雄安新区的第三点定位——“千年大计”，这个说法确实值得研究，何为“千年大计”？即使真的是“迁都”，称得上是“千年大计”吗？可能也算不上，而此前人民日报更是直接澄清，指出雄安新区不是“声东击西的迁都”，也不是再建“首都副中心”。从种种信号看，雄安新区之所以能被称为“千年大计”，可能与未来酝酿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如果从更大的图景纵观历史全局，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设立的试点都是中国改革与开放过程中的关键时间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开始改革开放，而深圳特区就在此时诞生，可以说深圳特区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此后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中国民众开始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而经济增速更是下滑到4%以下。这轮经济周期的拐点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此后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而这正是浦东新区诞生的时点。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中国的内生经济周期与改革与开放密不可分，1979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的小平南巡、9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WTO都曾经通过释放改革与开放的红利，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走向。而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调整周期，经济呈现L型走势，底部已经逐步探明，但如果需要拐头向上，则需要

新一轮改革开放，即第四轮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释放。

但这一轮的制度改革与之前相比又有不同，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初步完成，此后的改革将逐步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不能再回避的话题，同时对提高当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而言，也比经济体制改革来的更为重要。从这一角度看，雄安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史的意义可能比深圳和浦东更大，深圳和浦东是顺应了两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而雄安代表的，可能是本届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更大的雄心壮志。这也与雄安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其临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发挥更大作用。从另一角度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多年，政治形势较为复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会出现“大船掉头难”的现象，而如果将部分政治资源转移到临近北京的雄安，未来则可能在改革过程中另辟蹊径、收到奇效。

另外，近期有两个信号值得关注，一个严肃而一个略显轻松，这两个信号都表明，本届中国执政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态度可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一个严肃的信号是中国正在进行一轮新的反腐，而这次的反腐的重心在于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作为权利寻租与变现的最便捷途径，是反腐难度和阻力最大的领域，然而中国近期在金融反腐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正在改变市场的这一认知。

4月初，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几乎同时，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传言被带走协助有关纪检部门的调查。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已经通报了11名来自金融监管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而另一方面，近期市场亦传言有多位资本“大鳄”落马和接受调查。金融体系的反腐可能是一个信号，其背后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当前中国的执政者正在打破过去形成的一些僵化的利益分配机制，这种对相当长时间内既得利益者的打压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最难的一环。

另一个略显轻松的信号是近期中国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和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充斥屏幕的玄幻、言情类型作品不同，这次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当代反腐题材电视剧，该剧于3月28日播出之后登顶几乎所有收视排行榜的首位，也迅速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甚至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版的《官场现形记》。早前反腐题材电视剧自2004年之后都未能在电视黄金档播出，但出人意料的是，《人民的名义》这样题材敏感、尺度超前的作品反而仅仅只有十天就通过了审查，过审速度远远超过了该剧的原创者的预期。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部电视剧除了引起话题热议之外，甚至开始产生了现实中的效果。例如电视剧中被批评的信访局低矮的“蹲式窗口”就被频频曝光，一些官方媒体也对此作出评论，《人民的名义》虽然落幕了，但中国的反腐则永远没有终点。从这一点上看，中国高层这次对于反腐和改革似乎是要“玩真的”了，对于存在的问题不再以“政治敏感”的理由遮遮掩掩，而是鼓励舆论和普通民众共同监督，如果能

持续在全社会营造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氛围，未来的改革效果确实值得期待。

总体上看，从近期的官方表态和舆论导向上看，中国似乎正在酝酿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执政者能够下定决心，找对路子，中国可能会顺利推进第四轮改革与开放，而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率则有望借此向上突破，重新回到两位数的高增长。若干年之后回头看，雄安新区可能正是这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引子，那么用“千年大计”，甚至更夸张的表述来定位雄安，也并不过分。

聚集中三角

武汉去年专利申请破4万件 同比增三成

何佳俊 龚勋 《香港商报》2017年4月21日

19日，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7年武汉市知识产权宣传周主要活动安排》及《2016年武汉知识产权发展状况》、通报《2016年武汉市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和宣传武汉市委市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打击侵权假冒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的行动和取得的突出成果。

2016年，武汉市专利申请量44826件，较上年增长33.3%，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20643件，年增长率达到36.9%，仅用三年时间就实现翻番，首次登上2万件关口。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武汉市2016年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第7位，比2015年晋升2位，缩小了与深圳、成都、广州等城市的差距。共10个项目获得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其中，中国专利金奖1项，中国专利优秀奖8项。26项目获湖北省第九届专利奖，其中专利金奖8项，专利优秀奖15项，外观设计金奖1项，外观设计优秀奖2项，实现了专利数量和质的双提升。并且2016年武汉市积极推动商标监管服务创新，促进集聚发展，新增商标申请量39272件、商标注册量25943件，比上年分别增长21.25%和17.81%；驰名商标新增10件，比上年增长12.66%；省市著名商标分别新增90件和71件，比上年分别增长11.06%、8.89%；新增地理标志5件，总量达到34件，位居副省级城市第一。

支持国家知识产权强市落户武汉

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武汉知识产权法庭、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落户武汉，使得武汉市具备了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的良好基础。

2016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武汉、成都、南京、苏州四城市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管辖的专门法庭，为下一步新设第二批知识产权法院打好基础。目前，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已选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并于2017年2月22日正式成立，成为湖北省第一家跨行政区域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机构。

中部省份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台湾 中评网 2017年5月11日

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内沿边和沿海省份都看到了战略机遇。不过，中部省份却因为“既不沿边、又不沿海”而多少有些踟蹰。笔者认为，中部省份应更好发挥既有优势，解决目前存在的制约发展的若干问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形成对“一带一路”的内部支撑。

发挥“中心地带”优势

中部省份的这种踟蹰，首先体现在思想上尚未充分认识到自身参与“一带一路”的优势。中部省份应充分发挥作为“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积极主动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双向开放力度，形成切合自身的发展战略。

中部省份位居中原腹地，各大城市长期承担着交通枢纽的重任。郑州位于京广铁路、陇海铁路交会点之上，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承担着全国的货运枢纽任务。南昌贯通京广、浙赣湘黔线，沟通长江经济带和东南沿海地区货运。

近年来，中部省份积极参与中欧班列，郑欧、赣满欧、合新欧等已实现常态化运行。郑欧班列更是于近期实现“去五回四”，基本均衡对开，在国内中欧班列中保持领先地位。中部六省都是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总人口达3.65亿，占全国人口的26.5%。不过，平均工资水平不及东部，这也使得劳动力价格优势明显，蓄积承接产业转移的势能。

中部省份能源资源丰富，而且开发历史悠久，形成了相对齐全且有所“偏重”的工业体系，培育了大批领跑全国的能源资源型企业。

千百年来，中部省份一直是我国的重要粮仓，农业生产经验丰富。河南省是我国的粮食核心主产区，近年来粮食种植逾1.5亿亩，全年粮食产量约6000万吨，居全国第二。皖赣两省作为我国茶业大省，近年来茶叶出口不断增长，2015年1~10月，安徽茶叶出口5.01万吨，出口额全年突破2亿美元。

中部省份旅游资源丰富。历史为中部留下了深厚的文化资源，如：安阳殷墟、黄帝故里、皖南西递宏村、“瓷都”景德镇等。自然风光优美独特，如黄山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庐山亦享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美誉。中部省份侨胞资源深厚。以河南省为例，现有豫籍侨务工作对象230万人，其中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100万多人，分布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省内归侨、侨眷130万多人。

弥补“大而不强”短板

虽然中部省份有着种种优势，但不得不承认，中部省份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使得中部在近年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略显蹒跚，后劲不足。

——中欧班列线路众多，但建设不足且存在自相竞争现象，有待统筹协调。中部

省份个别班列发展滞后。以合新欧为例，自2014年启动，到如今方实现“一月三列”的运行规格，与渝新欧高峰时“一周三列”形成鲜明对比。返程空箱现象严重，造成运输成本过高。在对外运输议价上，班列线路各自为战，导致议价能力缺乏。为了竞争货源，各地政府争相提高补贴力度，缺乏统筹协调，缺乏可持续性。

——中部省份长期以来重工业比例过高，产业结构失调有待调整。以河南省为例，2015年河南省内六大高载能行业增值占工业比重35.3%，高技术产业仅占7.6%。非化石能源占比仅5.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个百分点，能源结构调整任务艰巨。中部省份高载能产业产能过剩严重是普遍现象，急需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

——农业大而不强，农业品牌特别是国际品牌建设不足。作为我国农业主产区，中部粮食种植仍处于粗放发展阶段，农业机械化程度过低。2015年底河南省农业机械化率为77.5%，机械化水平尚需提高。另一方面，中部农业长期扮演原材料供给角色，处于产业链下游，缺乏上游建设。皖赣两省茶业出口已在量上做大，但始终缺乏全球性品牌。

——旅游业不温不火，旅游吸引力不足。在2016年中国旅游城市吸引力排行榜中，千年古都洛阳位列第20，黄山位列第34。这已在中部排名最高，但仍远不如重庆（位列第三）、成都（位列第四）等西部省份。究其原因，其中一条就是中部地区旅游景点缺乏宣传推广。

——教育短板突出，高等教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瓶颈。全国逾百所“211”大学中，安徽三所，河南、江西各只有一所，中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河南、安徽、江西三省每十万人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均在2200人左右徘徊，远低于北京（5218人）、天津（4185人）。中部省份的高等教育已成瓶颈，难以适应“一带一路”下实现中部崛起的要求。

抓好“一带一路”机遇

面对当下问题，笔者认为中部应当紧抓“一带一路”重大机遇期，做好以下几个方向的工作，发挥优势，弥补短板，实现中部崛起。

一、承东启西，连接“一带”与“一路”。

“一带一路”向西出境联通中亚、欧洲，向东出海沟通亚太环线。中部省份既不沿海也不沿边，作为“一带”与“一路”的中间带，应当做好“一带一路”两线的联通工作，防止“一带一路”出现“中部脱节”。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应发挥好“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作用，做好大宗商品货运物流工作。对内，完善“铁公机港”网络建设，增强跨区域运输能力，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范围，增强货运集散能力；对外，班列之间可建成市场联盟，做好市场及功能细化分工，增进协调合作，避免恶性竞争，提高议价能力。中欧班列是市场经济产品，应当促进班列运营企业创新投融资及运营模式，逐渐减弱政府直接财政补贴，使中欧班列以市场化方式健

康成长。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增进与沿线国家高层沟通，提高沿线国家海关协作能力上，简化中欧班列通关手续，促进亚欧货运电子信息一体化平台建设，提高货运效率；积极牵线，为中欧班列创造更多货运订单，实现往返货运平衡，将更多国外产品运进来，释放中欧班列最大潜能，建成铁海互通、连通东西的物流通道。

二、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当下正值国际产业转移大潮，低端生产链逐渐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中部省份应紧抓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大机遇，发挥毗邻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积极承接东部省份转移产业。河南省内食品加工制造业、汽车装备业产业基础扎实，享有多个国内著名品牌，可进一步吸引相关产业赴河南投资建设，形成集群效应，打造高端食品基地和汽车装配基地。安徽省应继续以中德产业园区为基础，发挥中科大的科研优势，进一步深化与欧美发达国家产业合作，形成跨国产业合作基地。

面对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的情况，各大重工能源企业应当在升级产业技术的同时，更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积极发挥作用，到中亚、欧洲等地参与基础设施、能源开发等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实现国际范围内产能供需配置平衡，促进中部经济转型升级。

三、发挥既有农业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将郑州打造成为亚欧地区农产品金融中心。目前农产品金融化正成为潮流，各类农产品期货交易遍地开花。郑州作为亚欧大宗农产品集散中心，建有粮食期货交易中心，应当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加强跨国农产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亚欧农产品金融中心。同时，要着力增强农业金融制度建设，严防严控金融欺诈，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加大力度实现农产品“走出去”。要积极与国际标准接轨，扩大农产品出口，打造全球性农产品品牌。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一条丝绸之路也是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当下尤其应当树立国际品牌意识。安徽、江西等茶业大省应增强国际市场调研，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市场，提升推广力度，打造国际性茶业品牌，利用中欧班列将中国茶带到世界各地，复兴“茶叶之路”。鼓励农业跨国合作。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粮食安全成为世界性议题，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抓手。应鼓励农产品“走出去”，到“一带一路”中面临粮食危机的地区，展开农业援助合作，建设农业合作园，提升当地农业生产能力。同时“引进来”优秀农产企业，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延长农业生产链，实现农业增收。

四、放大旅游资源价值，搭建海外华人华侨交往桥梁。

中部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作为老牌旅游景点，近年来却后继乏力，为更多新兴旅游城市所赶超。中部应借力“一带一路”，打造“丝绸之路”旅游品牌。增强国际宣传力度，参加国际旅游推介会，增强与国际友好城市洽谈对接，让世界认识中国中

部，了解中国中部。中部应以历史文化资源为支点，打造更多团结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文化项目，撬动华人华侨资源，吸引侨胞归国投资、促进侨胞之间沟通交流，将散落在外的华人华侨紧紧拧在一起，发挥其重要力量，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五、培养高素质人才，支撑产业国际化发展。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中部的痼疾，长期以来制约其发展。在“一带一路”全线开放的时局之下，中部省份应当着力突破高等教育瓶颈。

实现教育资源“引进来”，鼓励各大高校吸纳海外优秀教研人才，提升教研水平；建设“一带一路”中欧班列沿线国家校际交流、人才互换机制，拓宽学生视野；高校内部增强国别、语言研究，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做好基础性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性人才，支撑产业发展。增强各个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对接，培养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人才；积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优质国际教育资源，提高技术人才国际化水平，进而带动产业走向国际化，实现中部崛起。

六、树立规则意识，引导市场良性发展。

规则意识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各市场主体应树立良好规则意识，切实遵守各项市场规则，做好行业协调，不随波哄抢、不恶性竞争。政府应积极做好引导工作，维护市场良好秩序，避免企业一哄而上，陷入无序竞争，扰乱经济正常运行，强化法治精神，做好“裁判员”工作，恪守“裁判员”职责，不缺位、不越位。

“一带一路”将亚欧大陆重新带回全球发展的中心，给内陆发展带来机遇。中部省份作为中枢腹地，应当在“一带一路”承担东西互济、海陆联通的角色，实现中原腹地经济崛起、文明崛起。

改革探索

中国供给侧改革药方对吗

美国 多维新闻网 2017年4月17日

近日，随着最新资料的陆续出炉，中国经济再次吸引了海内外的目光。中国一季度宏观经济资料GDP同比增长6.9%，央企实现首季开门红增利23.2%。钢铁、煤炭、石油、石化转亏为盈，央企负债率降低，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取得预期收益。那么，中国供给侧改革未来又将如何发展演化？对于一些领域在改革中存在那些忧患，机遇和挑战呢？经济学人智库近日发布《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进程与展望》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因为中国官方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中长期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刺激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推进结构改革。中国供给侧改革

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大不同。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给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减税、紧缩货币等，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15个字构成当前供给侧改革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处置僵尸企业，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和补充供给短板等具体方面。供给侧改革对于任何中国经济前景分析而言都是核心的考虑因素。

诊断准确药方对吗

多年来中国经济通过货币和财政刺激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导致了结构性失衡和金融风险。宽松信贷造成在产能过剩行业中僵尸企业数量的攀升；金融系统面临过度投资造成的巨大的房地产库存风险；以及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消费者需求的不相匹配。供给侧改革药方对吗？在诊断经济疾病方面政府并没有发生偏颇，但供给侧改革的具体举措是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

《进程与展望》指出，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钢铁和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有所化解，2016年中国退出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未售房地产库存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通胀上升缓解了企业的债务偿本付息压力，增值税改革宣告完成，中国制造2025规划出台，着力补短板。

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存在挑战。例如，过剩产能的降幅并非表面上看的那样明显，因为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原本闲置的产能。房地产库存虽有下降，但降幅不大，引导老百姓到三四线城市购房方面进展甚微。通胀上升可能也是短期现象，去杠杆方案如债转股等，整体而言尚缺乏说服力。扩大适用增值税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并不明显，降低企业所得税的计划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认为，预计未来煤炭和钢铁去产能的进程会放缓，这将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2016年去掉的大多是闲置产能和私营企业的产能，并未延伸至更敏感的国有部门。地方不愿推进国有企业削减产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系统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因为银行将因此被迫消化更多的不良贷款（NPL）。二是国有企业员工队伍庞大，养老金负债更高，削减国有企业产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觑。未来的去产能举措可能会波及产能利用率低于75%的水泥、家用电器、烟草业等。

报告预测，未来去库存的效果将非常有限。投资者的不安和关键性改革进展缓慢将很难刺激中小城市的需求。让国民经济摆脱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依赖将是极具挑战性的一项工作。限制房地产供应的努力将面临政策困境，因为地方政府依然依赖土地财政，房产税在2020年之前很难落地。

一旦经济增长再次放缓（很可能是2018年），政府去库存的决心将面临考验。如果放弃2016年采取的楼市降温措施将再次吹胀房地产泡沫，导致房价进一步脱离收入和

人口等经济基本面。要想确保泡沫不会破灭，政府只能推迟放开资本市场和海外投资，以保证能够留住国内储蓄，但这将拖累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进程。

债转股杠杆的另一化身？

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底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已达到185.6万亿元（合28万亿美元），在名义GDP中的占比为255.6%，且远高于中国之外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186.5%）。中国国内企业债务在中国债务总额中占比达到了65%，相当于GDP的166.2%。其中国有企业占了大头，国内数据显示国企债务在企业债务总额中占比达到了70%左右。

企业去杠杆最常用的手段是收紧货币政策，历史上看，收紧信贷往往会首先对民营企业产生冲击，尽管其效率更高、单位债务创造更多GDP的能力也更强。缺少完善贷款投向领域的改革的话，收紧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下行压力会超过预期。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文件显示政府方面支持实施多种政策缓解企业债压力，其中包含七大措施：鼓励企业并购；公司治理改革；推广证券化；改善债务结构；债转股；允许更多企业破产；鼓励股权融资。

经济学人智库认为，债转股等政府支持的去杠杆方案，由于有结构性难题存在，因此难以在企业去杠杆问题上产生实质性进展。更重要的改革在于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尤其是国有企业。债转股方案的结构设计凸显出风险在于政府有意将企业偿债负担转嫁给家庭部门。BIS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底国内家庭部门债务在GDP中的占比为43.2%，全球平均值为58.1%。不过由于房价上涨推高抵押贷款，家庭部门债务正快速增长。

企业税负将降低，政府也将致力于降低企业的行政费用和社保相关的负担。预计企业税税率不会下调，并且2018年环境保护税的引入会明显加重工业企业的税费负担。

在补短板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背景下，政府对创新的大力支持将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其在制造业供应链中的地位，提高竞争力。其实，国内制造业整体而言仍停留在高科技价值链的低端，在核心技术研发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同行。国内制造业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倡议和投资，消除行政和体制性障碍。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创新的举措会相对低效。相比于国有企业，私营技术公司将在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认为，供给侧改革如果不是一项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工作的话成效会更为明显。与经典供给侧经济学不同的是，这一改革政府发挥着主要作用。比如说，削减过剩产能就是在政府行政命令而非经济学逻辑推动下实施的一项工作。政府目前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方案而不是宏观的货币政策来推进去杠杆。

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不愿让市场发挥推动供给侧改革作用意味着这场改革的落实将过多依赖于政治意愿。因此这一改革不应被解读为中国的里根经济学，也

不能被视为中国经济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未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还需进一步做细做实，从而为中国经济实现华丽转型积聚新动能。

国企新常态下的制造业转型创新

夷萍 黄敬义 胡伟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5月12日

“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巨大挑战：产能过剩，业绩下滑；增长缓慢，竞争加剧；效率低下，难以永续；能力不足，制约发展。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在3月份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强调，中国制造业需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制造业升级。为了应对增长趋缓和竞争加剧的挑战，制造业企业应通过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有效利用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和IT技术提高运营效率，促成制造业的转型创新，为制造业企业注入活力，进而提高竞争力。

其实近几年有些企业已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突破，尤其是家电制造企业，引领了制造业行业的创新转型升级，在此希望通过家电行业的案例研究，能够抛砖引玉对其他制造业企业具有借鉴意义。

传统家电行业注重产品本身，即产品实用性、性能和设计，然而这一模式正面临着四种内外部挑战：首先，研发和设计资源有限，企业内部封闭的研发模式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其次，生产成本提高，定制化需求增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有待提高；再次，随着人均收入增多和消费升级，企业需要为消费者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最后，家电市场竞争趋于同质化和“大宗商品化”，差异化竞争势在必行。

为了应对这四种挑战，家电行业的制造业转型从四方面出发，即用途人性化，生产自动化、产品智能化和竞争差异化。这些应对方式强调研发和产品设计以客户为中心，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出差异化产品。

为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开始尝试与外部优质资源进行合作，更深入地了解消费者需求，注重产品用途的人性化设计。开放创新平台成为家电制造业转型创新一大亮点，这一平台通过和消费者、供应商及其他市场主体的直接对话，利用涌入平台的需求、技术和知识，企业能够了解客户当前和潜在的需求，把握市场趋势，加速人性化技术和产品的涌现，实现生态圈内的共创共赢。

以白色家电企业海尔为例，近几年推出的HOPE（开放创新平台）旨在让全球的用户和资源在平台上零距离交互，用户可以直接在HOPE上提出生活中的痛点，工程师们会给予专业的回答，并拆解相关的技术需求，为这些相关技术需求寻找合适的技术资源。同时，越来越多的研发技术需求和方案在HOPE上发布，产生大量迎合客户需求和用途人性化的产品，一些产品已经被投入市场。

2. 生产自动化：以高效多产的方式迎合定制化需求

目前，大多数国内工厂仍是劳动力密集型，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较低，生产信息化

管理系统相对孤立，数据分散且透明度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小批量、定制化要求的增多，工厂的成本和效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智能工厂强调在企业内部统一的信息管理体系基础上，集成MES系统，计划、调度、生产，通过控制技术和相关环节实现互动、组织生产，做到人和机器的高度匹配，在较低成本下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未来，只需将收集分析的市场大数据实时传送到配料、生产部门，进而通过独一无二的部件识别，将元器件自动分配到相应的生产线上，而产品部件上的代码，则可以通过和设备“通话”，在柔性生产线上完成一系列不同型号乃至不同类型产品的混线生产、智能检测等过程，随后将符合标准的产品传送到制定的物流仓储点，最终实现在较短的周期，为不同客户提供符合要求的定制产品的目的。

智能工厂意味着智能化生产不仅需要自动化，更需要设备间、设备和系统、设备和产品线之间的实时信息互动。这对现阶段正在布局智能工厂的家电企业来说仍是待解决的一大课题。

3. 产品智能化：生产为客户带来附加价值的智能化产品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家电市场逐渐饱和，增量市场主要为需求增长缓慢的农村地区，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的过渡要求家电产品逐渐从普及转向更新，而智能化是产品更新的重要方向。家电市场中的几个巨头纷纷研发、生产和销售智能产品，力图在智能家电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智能电视是家电产品中最先触网的产品线，长虹和TCL在推出智能电视之后，又推出了智能空调、智能冰箱和智能洗衣机等一系列产品。以冰箱为例，产品可以自动采集用户数据，从而推测出用户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并且有针对性地推荐菜谱和生活健康建议。同时，一些冰箱产品已经和第三方平台相连接，用户可以通过冰箱直接在第三方购物平台上下单。这一智能产品探索了客户体验转型的方向，为客户来了高附加价值。同时，随着传感器技术的精益，家联网概念的成熟，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发展，智能电器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将达到新的高度，新的智能产品将不断涌现。

4. 竞争差异化：以差异化产品打造可持续业务

近年来，国内众多传统家电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纷纷开始智能家电市场的布局，智能家电产品逐渐成为家电企业厮杀的红海。为了避免依靠价格的恶性市场竞争，家电企业还需发掘自身优势，设计和生产差异化产品以增强企业业务的可持续性。

目前，智能家电在远程控制、易用性和节能性等方面进步显著，已推出较多成熟的产品，但是在家庭互联网方面仍有待改善，如在产品的网络化、开放性和兼容性方面，不同家电和不同品牌家电之间的兼容性不够成熟。举例来说，客户需要用不同的手机客户端去监控不同的智能家电，而不能用一个客户端去监控所有的智能家电，这极大地影响了客户的使用体验。因此，强调家电和人、家电和家居之间互动的“智能家居”，可

以作为企业竞争差异化的一大切入点。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受政策指引和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方兴未艾。以上案例都是制造企业在转型创新领域的探索，未来是否成功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却标志着中国制造业转型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如何应对“新常态”下各类挑战和不确定性，如何让企业在艰苦的商业环境中实现并保持增长？笔者认为，围绕核心能力体系打造一套连贯有效的战略是成功的关键。战略需要服务于企业在“新常态”下全新的增长目标，并能够在成本压力与日俱增的市场中，为后续可能开展的有针对性的资源配置、组织转型和变革管理提供整体的指导思路，从而充分利用转型创新的机遇，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在经过市场的历练后，成功企业能凭借更有针对性的战略、更健康的成本结构、更创新的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更贴近世界领先水平的实践方式，成为“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最坚定的践行者。

经济广角

中国经济反弹强劲 货币政策转向收紧

沈建光 香港《大公报》2017年4月19日

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全面向好，但可以看到，除了外需反弹以外，内需的回升与政策支持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过强经济反弹可能会使得前期稳增长政策力度明显减小。今年中国经济呈现开门红态势，如今3月份成绩单出炉，明显好于预期并验证了笔者判断。其中，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齐发力，投资的三个主要分项：

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均呈现反弹，民间投资更是一改去年社会各界的普遍担忧，出现积极向好态势。在此背景下，一季度GDP超预期增长6.9%。

稳增长目标已达成

但也不难发现，此次增长反弹与前期政策面的宽松密切相关，如基建发力离不开各类政府引导基金、专项建设债券与地方债务置换的支持，房地产也与住房信贷宽松有关，甚至连民间投资的反弹也得益于PPP项目的政策鼓励与支持。本轮反弹已经超出了决策层稳增长的预期，引发政策已由稳增长转向防风险，而一季度如此强劲的资料让笔者有理由相信，未来政策转向会更加猛烈，让下半年经济减速。

具体来看，一季度经济反弹向好的态势似乎是全面的，不仅体现在投资方面，消费与出口亦是出现明显好转。例如，消费方面，1至2月消费数据并不理想，但在笔者看来，年初消费下滑主要是季节性因素，与去年底网络促销提前透支消费、春节境外游增加带动境外消费，以及汽车购置税优惠减半降低汽车消费等短期的负面冲击相关。3月份消费资料，特别是汽车消费反弹验证了笔者对于消费并不悲观的判断。

出口方面也有超预期之处，作为前两年拖累增长的重要因素，近两年在两会政府工作目标中，外贸目标已经被剔除，不再提及，凸显了决策层对于出口态势前景的担忧。而今年一季度出口出现明显改善，这主要与当前海外经济复苏的背景有关，对于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是个利好。此外，习特会后特朗普表态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意味着中美贸易战的阴霾正在逐步减退，这对于未来中国出口的不确定性又有所降低。

在三驾马车中，前期投资方面的发力对于本轮增长的反弹是最不容忽视的。而综观投资的各个分项，又有明显的政策支持痕迹。例如，基建投资方面，一季度保持了23.5%的高速增长，这与同期挖掘机、重型卡车、起重机等工程用品的销售火爆情况相得益彰，与PPP项目加速落地，各类国家引导基金的火爆密切相关。甚至民间投资也参与其中，去年一度大幅下滑的民间投资引发了决策层的广泛担忧，而如今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带动了企业利润的回暖与投资热情，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7.7%，增速继续反弹，说明民间资本参与度提升，同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投的比重提升至61.1%，预示着当前经济活动的活跃。

去杠杆力度超预期

此外，房地产投资向来与政策周期联系紧密。由于前期房地产去库存下的信贷、税费等多项支持，去年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直至今年3月份，房地产泡沫仍在集聚，引发了本轮房地产调控升级。如今一季度房地产投资与新开工均处于上升势头，特别是新开工作为领先指标，其反弹意味着短期房地产对经济负面冲击有限。而房地产销售与土地购置的增速已在3月份有所下滑，预计这种影响或在下半年出现。

笔者认为，过强经济反弹可能会使得前期稳增长政策力度明显减小，特别是今年去杠杆的力度可能要比预想中要更加猛烈一些。不难发现，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政策已经由稳增长逐步向防风险转变，特别是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收紧势头。一是价格方面，今年央行曾多次运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提高SLF(常备借贷便利)，MLF(中期借贷便利)等政策利率；二是从数量来看，表内信贷也在3月份传统季末冲量的月份一反常态，3月份表内信贷资料比2月份有所下滑。

但在财政政策方面，仍然比较积极，特别是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较大。根据发改委资料，一季度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2409亿元人民币，项目主要集中在水利、能源、交通等领域；PPP项目落地明显加快，3月底PPP项目达到2579个，其中一半以上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落地的；地方引导资金爆发增长，有统计称去年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超过3.1万亿元，是2015年的一倍；由中央财政贴息，定向发行的专项建设债券两年内也已安排资金投放金额超过2万亿元。

展望未来，鉴于一季度经济资料明显的向好，预计决策层会有更大的决心将政策重点转向防风险，这也使得未来收紧的政策态势更加清晰。短期内经济增长由于前期

项目开工仍然保持较高增长的背景下有所支撑，但在政策偏紧背景下，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或将减速。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坚持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呈现前高后低的整体趋势，一季度经济或许是全年的高点，下半年经济有所回落，全年GDP增速或略高于6.5%。

中国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沈建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5月3日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一行三会领导就各自领域重点问题与如何防范风险进行介绍，会议提出了进一步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六点任务，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处理风险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以及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在笔者看来，本次政治局会议有两点不寻常之处：一是这是十八大以来，政治局首次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主题进行集体学习，出席人员规模之高，涉及部门范围之广超出以往金融专题会议；二是会议罕见地将维护金融安全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凸显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视和自上而下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金融系统到底有哪些风险值得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如此重视？上述风险是否到了危及金融安全甚至治国理政的程度？而一旦中国开启了一轮从上至下的防风险行动，能否能够取得效果，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中国金融系统到底有哪些风险？

以往对中国金融风险的警告往往来自于海外，不仅包括IMF、BIS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包括一些海外对冲基金与机构投资者。前者只是从经济理论上提供金融风险的判断依据，而后者则往往在看空的同时又采取做空策略，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为直接。然而，对待上述警示，过去中国决策部门大多表态比较自信，不予理睬或者反驳批评作为回应，而此次会议中国高层直视问题的重要性与严峻性实属难得。

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有哪些？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企业杠杆率大幅攀升，影子银行规模过于庞大，信贷资金大多进入房地产与收益较低、期限较长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资产价格超出合理水平，僵尸企业、预算软约束企业扭曲银行的定价机制，民间集资与P2P等游离于监管之外，汇率政策缺乏灵活性等等都是中国金融系统潜在的风险点。IMF在最新4月19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中提到中国信贷快速增长使得金融稳定风险不断增加。IMF报告中提到，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已达到GDP的三倍以上，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敞口也有所增加。中国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存在着严重错配，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处于较高水平。而在去年10月IMF的一篇《Resolving China's Corporate Debt Problem》工作论文中，提到中国2009年-2015年间信贷平均

增速高达20%，大幅超越名义GDP增速，需要防范西班牙、泰国以及日本这些信贷缺口类似经济体的前车之鉴。

而国际清算银行BIS近年来也频频警示中国银行业风险，根据BIS在2015年9月首次提出的以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测量各国债务水平的指标来看，中国在两年前这一缺口指标便已经高达25%，超出2%-10%的正常范围，是全球最高水平。以史为鉴，BIS提出一旦一国缺口指标超过10%，随后三年，该国有2/3的概率发生“严重的银行业紧张情况”，并预测中国会在三年内发生银行业危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有过激烈的观点交锋，针对吴晓灵提到的中国债务率并不严重的观点，马丁·沃尔夫之言，危机爆发前决策层往往都认为没有问题，如英国银行在遭遇30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之前也称其资产负债表表现很好，但危机往往在忽视中爆发。而在近期专栏文章《中国如何摆脱债务陷阱？》提到，中国仍然需要依靠债务快速增长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而且摆脱这个陷阱的所有方法，看上去都很艰难。

中国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既然金融风险近年来一直都存在，但为何中国并未出现教科书中的危机并未如期而至，是什么独特之处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3月20日发表的央行工作论文《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对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经验进行了梳理，其中提到不少有益观点。在笔者看来，文中提到的诸多中国创新的货币政策实践操作，或许与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联系紧密，具体包括：

一是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与大多数国家单一通胀目标制或者就业与通胀双目标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六大目标。而根据以往经验，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在操作中的权重也会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金融危机之时，由于担忧经济增长与失业，中国央行便出手很快，但美联储并未对雷曼进行救助，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后期救助成本显著增加，甚至量化宽松，零下限等金融创新纷纷而至且传染至其他国家，直至今日，全球经济也未恢复到危机之前，全球货币政策仍大多处于从非常态之中。

二是并未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不可能三角理论讲述的是一国央行不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而根据过去中国的金融实践，中国大多数时候并未选择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而是通过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独立的中间状态的选择指导中国实践，避免了资本大规模流动对经济的冲击。此外，金融危机以来的经验又显示三元悖论逐步向二元悖论转化，即不论采用何种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都不可兼得。

这也说明，理论总是不断完善的，实践的发展往往领先于理论，一味默守书本理论，有时并不明智。

三是创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在计划经济初期，中国大多应用数量型工具，而伴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微观主体自主决策能力的增强，数量型直接调控需要向市场化、价格型间接调控转变。但结合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央行创新使用了SLF、MLF、PLS等流动性工具，一方面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利率走廊（SLF为利率走廊上限）与中期指引（MLF是主要的中期政策利率）的尝试作为过渡，同时培育国债市场等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引导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四是协调推进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以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与大多数国家明显先后次序的完成利率、汇率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开放不同，中国央行在上述改革方面提出了协调推进的方式。同时，中国央行强调，即使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有管理的可兑换，特别是对反恐、反洗钱、反避税天堂等方面，是拥有严格监控的。此外，央行表示可以对短期资本流动和外债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甚至在应急情况下临时性外汇管制措施，这些也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盛行的华盛顿共识有很大的出入。而危机的出现也让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开始反思。

综上所述，中国在金融实践操作方面确实有不同于传统理论之处，甚至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中国实践的创新操作很多情况下是领先理论发展的，这使得中国的政策往往灵活性更强，或许也可以为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提供一个解释。

当然，这种观点往往会被质疑为自我吹捧，但中国央行的实践操作其实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许。笔者曾经在欧洲央行工作，当时时任欧央行行长的特里谢便从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央行及行长周小川的赞美之词。其实，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避免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中国的宏观金融管理是有独特的地方。

现在是化解金融风险的良机

更重要的质疑是，虽然中国通过政策创新避免了短期内的危机爆发，但只是将问题推后，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可能会有更大的危机与风险，而这也恰恰是笔者的担忧。但好在此次政治局会议显示了中国自上而下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诸多防范房地产泡沫、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举措都在持续推进，且防风险不仅集中在一行三会，更涉及到多个部门政策配合，有助于让这一最高决策层基调落实。

同时，考虑今年以来的经济内外部环境有所转好，内部一季度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实现了开门红，稳增长压力减小。外部方面出口一转去年的颓势，出现了大幅增长；四月中国首脑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改此前对华咄咄逼人的态势。此外，美元走强压力也在减弱，中国资金大规模流出态势也出现逆转。

所以，中国去杠杆与供给侧改革其实迎来了很好的机遇期，如果能够坚持这一基调，即便承受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放缓的阵痛，在可承受范围内，为中国拨出累积多年

的高杠杆高负债的毒瘤，有助于为19大后的中国经济更健康的发展奠定基础。

科教文卫

《侨报》专访：“中国航天的脚步不会停歇”

万淑艳 凌云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4月25日

今年的4月24日是中国第二个“航天日”。自2016年起，中国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以纪念中国航天事业成就，发扬中国航天精神。美国《侨报》近日采访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体室指挥陈风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领航”航天科普协会会长钱航。陈风雨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国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中国航天的脚步不会停歇，反而会迈得更稳、更快”。

长征七号实现多项技术新突破

“中国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国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火箭总体室主任、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体室指挥陈风雨近日在接受美国《侨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北京时间20日19时41分，搭载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全新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属于采用绿色推进剂的新型液体运载火箭，首飞于2016年6月25日顺利完成。此次搭载“天舟一号”发射可以说是长征七号第一个重大发射任务。

“长征七号采用了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普遍采用的大量新技术。”陈风雨说，长征七号有几个新特点：第一是新动力，采用了全新研制的动力系统，如采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和与之适应的新型低温增压输送系统；第二是新布局，助推器长度为现役运载火箭的2倍，采用三支点超静定捆绑方案；第三是新环境，由新型动力系统及多发动机并联导致箭上和地面的力、热环境严酷；第四是新结构，全箭结构全新研制，广泛采用了新型的2219铝合金等新材料，应用了搅拌摩擦焊等新工艺；第五是新体制，控制系统采用1553B总线体制，测量系统采用了天基测控等新技术；第六是新测发模式，采用新三垂的方式，火箭前端测发设备放在活动发射平台内，测试、转场、发射时状态尽量一致，大幅缩短了发射区时间。上述新技术在首飞和刚刚完成的第二次飞行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中国火箭发射成功率极高，而高成功率的背后是众多战斗在技术和管理岗位上的中国航天科研人员的默默付出，确保发射万无一失。

陈风雨介绍，近年来，火箭院在质量体系发展和完善上，取得了重大进步，非常

严苛。火箭研制过程中分几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都不能松懈，小到一个专业的攻关结果的确认、大到一个型号的阶段审查，组织管理机制非常完善，秉承了质量归零、层层把关的思想，确保了火箭设计、生产、测试、试验、飞各个环节的质量。

在陈风雨所在的火箭院总体设计部，提出了“质量29条”等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包括风险识别、控制等一系列规定在实战中不断完善，基于专业力量和型号缜密流程，把问题及时消灭，确保实现零隐患上天。“航天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长征五号、长征七号能够在2016年成功首飞，一方面取决于科研人才队伍的新老传承、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严苛的试验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在“长七”首飞前，陈风雨的心中是笃定的，成功一定是高概率。

五加二、白加黑是工作常态

陈风雨出生于1977年，2001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便来到火箭院工作。长征七号从2008年下半年立项，到2016年6月25日首飞，时间跨度接近8年，陈风雨亲身经历了长征七号研制的全过程。

2008年到2010年，这两年长征七号概念和方案设计阶段。陈风雨的岗位是弹道设计，而弹道设计是火箭复杂研制流程里位置最靠前的专业，大量的参数急需确定。那时刚满30岁的他便在工程组里承担了火箭的规划工作。最初，在长征七号选型工作期间，有三个月时间，陈风雨和许多同事的工作状态是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班最多时在72小时内只睡6小时。“正是那段时间，火箭院总体部勾勒出了中国中型运载火箭的系列型谱，起到很好的总体参谋的作用。”

从2010年开始，陈风雨便承担了长征七号总体主任设计师的岗位。“总体岗位对于专业素质要求非常高。我原来比较熟悉弹道设计专业，而到了总体岗位后，迎面而来的是13个专业，总体主任设计师对这13个专业都要懂，并在关键时刻要拿出主意，压力非常巨大，必须下决心抓紧学。”陈风雨戏称自己是“娃娃兵”，在前辈的大力支持下，从不会做到知道怎么做，到最后把工作做好，这是一个不断投入时间、努力成长的过程。

每天早晨7时出门，深夜离开办公室，在2016年长征七号首飞前，每周最多休息半天到一天，这种状态陈风雨持续了8年。他的小孩今年8岁，从出生开始，他就很少陪孩子。“我只有在周末能陪他一会儿，孩子天天盼望着过周末。”

而陈风雨这种“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状态，是中国航天人的缩影。“各级领导和长征七号的结构设计、生产人员，每年都是春节过后大年初三就开始工作，各种假期对我们来说就是奢望。”陈风雨说。

中国火箭综合水平居世界第三

“航天的脚步不会停歇，反而会迈得更稳、更快。”陈风雨说，“目前，中国火箭的综合水平位于世界第三位。”陈风雨表示，“我们距离世界第一航天强国美国还

有一定距离。”

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共和党人考克斯1999年提交了《考克斯报告》，诬陷中国窃取美国导弹和空间应用技术，夸大中国威胁，鼓动加强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自此，美国出台了更严格的对华高科技出口禁运，美国制造的卫星、航天器或采用美国部件的卫星及航天器都被禁止运往中国，从而使中国失去了国际航天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美国对中国航天技术封锁越来越严重。“只要有美国元器件的卫星产品就不允许进入中国发射。”陈风雨说，“中国的火箭是完全自主研发，就算全世界都对中国技术封锁，我相信中国火箭依然可以顺利发射。”

随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火箭的成功首飞，中国火箭的实力大步跨越，实现了升级换代。在陈风雨看来，中国火箭的产能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发射成本要进一步降低，使得航天产品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随着明星产品发射 航天科普工作愈发重要

“随着一系列‘明星’产品的发射，中国航天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航天科普工作愈发重要。”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领航”航天科普协会会长钱航对美国《侨报》记者表示。

科普团队以青年火箭设计师为主

今年年仅29岁的钱航已从事科普工作六七年，算是一位“科普老人”了。他从读研究生开始便钟爱航天科普工作，在北京天文馆担任志愿者，2015年从中国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便加入了火箭院。

2013年6月20日，神舟十号航天员乘组王亚平在太空中为全中国中小学生上了太空第一课，钱航是这次授课的地面授课老师，在大陆央视直播镜头前为中国观众进行了承重试验、陀螺实验等几项科学实验授课。“把物理原理给同学们讲清楚，让他们深刻理解到物理课本背后的意义。这个过程是非常宝贵的体验。”钱航说，随着中国空间站建立的步伐加快，以后会有更多航天员、科学家登上太空，后续会有更多太空授课的计划。

钱航负责的“领航”航天科普协会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重点打造的科普团队。团队目前有52名队员，以青年设计师为主，老一辈航天专家、总设计师、院士为指导，走到民众身边讲述航天故事。自成立以来，先后面向北京多家中小学开展了上百场航天科普讲座活动，受益中小学生近万人，并与一些学校建立了长期科普志愿服务合作关系。

科普课程体系丰富 教材将出版

目前，“领航”航天科普的课程体系颇为丰富，有五大类共30个课程，包括动手实践课程类如《太空授课实验》，航天基础知识课程类如《航天知识概述》，重点型号和热门航天事件课程类如《神箭托神舟》，专业课程类如《天文学》、《飞行动力

学》，航天精神课程类如《中国梦 航天梦》等。

钱航说，他们还精心设计了动手实践的课程，小学生做模块化的火箭，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根据设计图纸进行彩绘、剪裁、拼装，让同学们在实践过程中了解力学、电动力学、动力学等知识。

目前，“领航”航天科普协会正在开发航天科普教材，不久后将出版。“在实际科普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市场上的科普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我们作为航天科研工作，应该编写教材，确保航天知识的正确性与权威性。”钱航说。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航天知识

航天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何把高深的航天知识讲给民众呢？钱航说，科普是一种创新，要不断去想大家感兴趣的是是什么。科普团队以青年科研人才为主，还有各明星型号的总设计师、01号指挥员等，“我们把深奥的航天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出来，结合当时航天的发射热点，诸如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等，能迅速吸引受众。”

在中国第二个“航天日”到来之时，火箭院总体部与北京市教委于21日共同举办了“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航天科普进校园活动”，并与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签署了《航天科普教育进校园合作备忘录》，计划全年将在延庆、密云等北京郊县开展20余场航天科普教育活动，让广大中小学生不但能走“近”航天，更能走“进”航天。

探访中国科技馆“太空探索”展厅：趣味性、科学性缺一不可

中国科技馆工作人员胡滨与航天科普的缘分源于其为该馆“太空探索”展厅升级的策展经历。他发现当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以“快递小哥”的形象出现时，公众更容易理解何为“天舟一号与正在轨飞行的天宫二号交会对接，开展推进剂补加试验”。

“快递小哥”天舟一号近几日快速“吸粉”。这或许是航天科普的一个好例子，因为趣味性和生动性拉近了公众与航天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胡滨认为原则在于“航天科普有趣不能娱乐化，易懂也需具有科学性。”

在去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之际，升级后的“太空探索”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这更像是中国科技馆在航天科普方面交的一份“答卷”，解答着航天如何从尖端科学走到寻常百姓身边。

记者走进展厅，看到“火箭发射”展前围着不少小观众。一位小观众在拼装台上正确完成火箭模型拼装后，在启动发射按钮的一刻露出了笑脸。此时，发射场塔架的塔吊最先转动，然后回转平台按第四、第一、第二、第三层的顺序依次打开，先后展现出火箭的逃逸塔、助推器及一级火箭、二级火箭、整流罩及飞船等。伴随着火箭发射过程，语音解说系统进行讲解。

从产生飞天梦想到架起“登天之梯”（火箭），从发射人造卫星到载人航天，从奔向月球到迈向深空，中国航天发展的步伐构成展厅的主题脉络。“神舟飞船与空间

实验室展项按航天部门提供的真实图纸脱密处理后1:1仿真制作，大大满足了观众对宇航员太空生活工作的好奇心。观众尝试在神舟飞船返回舱内控制飞船与天宫进行交会对接时，我们并没有将这个环节设计得过于简单。”胡滨解释说，策展团队希望传递出科学性，让观众明白航天员在太空的手动交会对接也是经过反复训练才能够完成的。

如果馆内的展品（展项）仅仅是点燃观众兴趣的开端，那观众走出展馆之后的航天科普又该如何进行呢？以前，科技类场馆虽然也在展品展项位置增添了扫码获取相关知识信息的功能，但大多只是简单图文版“搬家”。胡滨说，未来航天科普会以更符合青少年认知的角度，借助他们喜爱的IP形象，讲出有意思的航天故事。同时，一些有趣的航天IP形象也会通过相关衍生品，随时出现在大众生活里。”

鼓励社会办医要做好“加减法”

于平 香港 凤凰网 2017年5月5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要瞄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进一步深化医改，改善民生。这为解决社会办医“难”开出了“药方”。

关于鼓励社会办医，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这个问题，相关部门还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应当说，在高层强力推动、国家政策多方面扶持之下，社会办医“难”在一些地方有所缓解。

但总体而言，社会办医“难”仍未有根本改观。国家层面的政策力度固然很大，但在不少地方遭遇“落地难”，对非公医疗机构的歧视政策取消了，但阻碍非公医疗机构发展的“玻璃门”依然存在。

在不少国家，开办一家私立医院的门槛并不高，流程和开设一家商店差不多，最快几天就可获得营业许可。但在我国，社会办医审批程序再简化，依然动辄需要几个月以上。所以，依照简政放权的思路，社会办医审批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要求，要对社会办医实行一站受理、并联审批、网上审批。连锁经营医疗机构可由总部统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

这样的要求，无疑是对审批的进一步优化。作为地方政府，一方面当然得不折不扣落实国务院的要求，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不能满足于此。根据本地方民情社情，对于鼓励社会办医，地方政府上完全可以走得更远。

例如，推动审批的透明，将非公医疗机构审批相关事项予以公布，并承诺每个事项办理流程的最长时限。每一家非公医疗机构的审批时长都应向社会公开。信息透明之下，公众监督才成为可能，这是解放社会办医、推动简政放权的重要依靠。

鼓励社会办医，要做“减法”，在审批环节下足功夫，同时也要做“加法”，给社会办医更多资源支持。

高水平的医生大多为公立医院所垄断，这是社会办医的最大瓶颈。此次国务院会议提出，实行医师区域注册，促进有序流动和多点执业。区域注册，堪称医生多点执业障碍的破冰之举，医师不再通过医疗机构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而是直接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这利于打破公立机构对于医生的束缚，保障医生的执业自由。

让医院无论私立还是公立，都能共享医生资源，这是推动医疗管理公平的关键一步。依此思路，公立医疗机构资源的开放，大有可为。

眼下许多民营医院医疗设备都较缺乏，而公立医院医疗设备尤其大型设备使用率不高，此前国务院《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就提到“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但设备共享的推进却不尽如人意。

其实在国外私立和公立医院不仅早已实现设备共享，在更多医疗服务支持上，同样实现了共享。例如国外医生在私人诊所里接诊，在病人需要手术时，医生可利用当地公立医院的手术室为病人手术。这种从人员、设备到服务的全面共享，不仅避免了设备的重复购买建设，也降低了社会办医的门槛。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之下，社会办医从来不缺少民间的热情。本着简政放权的精神，政府应营造更为公平的医疗管理环境，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清理不合理的土政策，打破公立医院的资源垄断。对此，我们期待着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

三农问题

2. 8亿农民工命运仍系于改革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5月2日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当前有农民工2.8亿人，人均月收入为3275元人民币，按年龄计算，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的主力军，占比达到了49.7%。同时，农民工欠薪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截止至2016年，还有236.9万农民工被拖欠工资。

农民工指的是户籍仍为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行业或外出打工的人，也就是说除外出打工的农民外，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也属于农民工。农民被允许离开户籍所在地打工和乡镇企业的出现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将农民从土地和户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到沿海地区打工，或根据本地情况创办和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民成为农民工，进而使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巨大动力，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民工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优势，农民工大量涌入沿海地区打工，为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同时，劳动力丰富也让中国能够进行快速的基础设施更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又可以转化为引资优势，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已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迅速起步的主要经验，比如印度总理莫迪就将此模式成为“邓小平模式”并引入印度。

农民工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其就业的多样化让中国经济结构更趋丰满和平衡，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被计划束缚固定，二是因模仿斯大林模式，存在着“重重轻轻”（即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结构性失衡，轻工业的主要功能是供应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人长期面临的日常生活用品匮乏主要成因就在于此。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搞活”，而农民工、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和返城知青、个体户等一起成为了“搞活”的主力，正是因为有他们存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限制和隔绝才被很快打破，并重组起了更富弹性、持续性和延展性的产业联系。

农民工的贡献不只在经济领域，对社会、文化等方面也有重大影响。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故乡出外打工，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守土重迁”“靠天吃饭”再不是中国农民的天然本色，农民工表现出为改变命运、“挖掉穷根”而敢拼敢闯的精神，体现出了中国改革时代的精神特质。当时出现了一批描绘农民工进城、创业的影视作品，有些影响还比较大，比如《外来妹》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工的构成和他们面临的问题也在发生变化。80后成为农民工主力军，可80后已经都有30岁左右，需要结婚生子，由于无法在城市落户（拿到城市户口），很多人无法解决买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不得不在把孩子放在老家有父母照看和干脆回乡之间做出选择。农民工欠薪问题久拖难决，甚至因讨薪发生恶性事件，政府虽三令五申，也仍有资方不履行义务，这既是因为农民工缺乏法律保护和法律援助，也与相关制度不健全有关。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工也需要在知识、技能等方面加强培训，过去那种只靠“卖力气”吃饭的方式也已不再适用，而这不仅需要农民工自己谋求提供素质，也需要教育、劳动保障等方面制度的健全。

回顾农民工出现、发展和变化的历程，不难发现，农民工作为一种新事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也为改革开放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们面临的种种问题也必须通过继续、深入、不断地改革来解决。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让农民摆脱土地和户籍束缚，让农民工得以产生，那么，现在的改革就应帮助农民工获得良好的劳动环境和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从而更好的释放他们的潜力，让他们能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成都发布重大土地改革政策：商品房用地一律拍卖出让

香港 凤凰网 2017年5月5日

为推进重大土地资源配置改革，完善重大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强化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监管，成都市政府于5月3日在官方网站发布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重大土地资源配置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对营利性社会事业用地、非公益性科研办公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商品住宅以及含商品住宅的用地，一律以拍卖方式出让”，将使经营性用地的出让行为更加规范。

《实施意见》还提出，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成都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抓好郫都区(微博微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一试点改革如得到迅速推进，不仅将在当地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还有望弥补国有建设用地的不足，这将对土地供应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商品房用地一律拍卖出让

《实施意见》提出，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划拨用地目录，严格限定划拨用地范围。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对营利性社会事业用地、非公益性科研办公用地实行有偿使用。经营性用地（含地上、地下空间）一律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商品住宅以及含商品住宅的用地，一律以拍卖方式出让。对于工业用地，《实施意见》提出，创新工业用地供给管理方式。坚持和完善工业用地有偿使用、市场配置制度。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工业项目特点，通过公开挂牌竞价，鼓励采用长期出让、弹性年期出让、租赁、先租后让和建设标准厂房等多种方式，满足工业发展用地需要。对具有龙头带动性或战略引领性的新兴产业，经市政府审议同意，其土地出让起始价可按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确定。

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这是《实施意见》的一大亮点，提出要“抓好郫都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进入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公开出让，并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相统一的交易规则。

发挥政府作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实施意见》提出，更好发挥政府在土地资源中的作用：统筹安排城市发展用地；合理分配年度用地计划指标；改进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合理高效利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与社会事业发展用地；完善房地产开发用地调控机制。

对于改进建设项目用地审查，《实施意见》提出，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改进和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报批。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使用已批准建设用地进行建设的项目，可不进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在用地预审阶段，不再对补充耕地和征地补偿费用等情况进行审查。已通过用地预审的建设项目，在用地报批阶段原则上不再重复审查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否符合土地使用标准等情况。

对于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合理高效利用，《实施意见》提出，鼓励市场主体收购相邻多宗低效利用地块，申请集中改造开发。涉及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等难以独立开发的零星土地，可一并进行改造开发。

《实施意见》提出，完善房地产开发用地调控机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土地资源、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对各区（市）县政府（含成都高新区（微博）、成都天府新区管委会，下同）每年房地产开发用地实行计划供应。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市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市场形势，研究调控对策，提出土地供应意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社会观察

知识付费时代真的来了？

刘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4月26日

2016开始，知识付费旧貌换新颜。知乎、得到、分答、微博、微信、果壳、36氪、虎嗅、钛媒体、小密圈……各路人马纷纷杀入知识付费战场，用专栏订阅、付费课程、内容赞赏、有偿问答、社群等形式实现内容变现。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界，在发现知识这个领域还可以刨到新的商业机会后，也开始扎堆进入，布局各自的内容价值平台。

于是有人惊呼：“知识付费的时代到来了！”难道以前我们很少为知识付费？

显然知识付费这桩买卖一直都是存在的。在互联网兴起之前，阅读文献、看出版类书籍报刊都是要付费的，而这些所谓的知识付费就是网上卖书卖杂志，载体换了而已，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把知识付费割裂看待。

可以说的是在互联网不断催化下，产业集中向技术密集和智力密集型转化，以无形资产形态存在的知识资本，在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于是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知识消费模式。据《2016年中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研究报告》显示，33.8%的新媒体用户已经产生过对新媒体内容的付费行为，15.6%的用户有付费的意愿但是还没有付费行为，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将近一半的新媒体用户产生了知识付费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产生，离不开中国市场三大维度的改变。

经济增长驱动消费新观念

一直以来，只有成功戳中消费者痛点的领域才能诞生出巨大的时代红利。在知识付费中，2016年最火的便是各类知识平台。例如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和得到APP，生长于得到的李翔商业内参，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每天听见吴晓波”音频，马东团队推出的“好好说话”音频课程、李善友和他的混沌研习社、樊登和他的读书会等等。

这些平台火爆的原因无外乎是一种人们思维转变的体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在人们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后，开始转向提升精神消费。特别是小白中阶层，为了追求更快的自我提升，进行碎片化的学习显然很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付费内容无疑是最能满足他们的产品，越来越多的小白中愿意去为了优质内容付费。

因此，新常态经济下消费观念的转变成为了滋生知识红利的根本原因。

信息量过载铸就消费新模式

互联网背景下，各种免费内容爆炸式涌现出来，信息量严重过载，于是人们不得不用付费的方式来筛选一些有价值的知识。据悉，信息量过载心理学家Iyengar和Lepper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相比于给消费者24种果酱，当只给他们6种果酱的时候，反而购买率最高，对选择的满意度也最高，证明选择并非越多越好。”

同样的当消费者发现，大量摄入重复低质内容不再能带来好处，又增加了自己时间成本的时候，发现自己本质上已经在为筛选深度服务付费了。这个逻辑在电商的发展层面，同样适用。当可选择量过载的淘宝慢慢被消费者厌倦，什么值得买、小红书、网易严选们则开始逐渐捕获消费者的心智了。而现在各大知识平台大V网红们替广大用户筛选好有看头的知识，于是付费似乎理所当然。

显然，互联网信息量过载成为了铸就知识消费新模式的前提条件。

价值效益激发消费新需求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消费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单一片面的内容模式，而是希望在内容消费中获得更丰富的愉悦。光看知识“有料”不行，还得“有趣”；光看整容脸不行，美女还得有一技之长；光看心灵鸡汤不行，你会被嘲笑太low，看遍了世界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

从这个方面说，今天的知识主题内容消费几乎是最成熟最丰富的内容类型。在知识经济市场，不乏有真正深耕内容价值的平台，消费者既可以从中获得真知灼见，满足旺盛的求知欲；又能通过丰富感人的剧情内容，获得精神体验；还可以推销某种观点，获得别人认同。内容的价值或利益高度相关，或足够新奇引人，总之能够不断给用户带来满足感。今后随着时代热点的更迭，知识付费会爆发出更多样化的需求，到时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形成知识付费的习惯并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无疑，价值效益成为了知识付费续航的关键动力。

无论从媒介还是内容方面看，中国人为知识付费的意愿都不低，并且付费行为促

使他们更珍惜内容。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知识红利会爆发式增长吗？

瑞士瑞信去年底发布的《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给出了明确答案：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达到了1.08亿。在有足够消费能力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优质内容付费，巨大市场机会摆在眼前，此时行业大佬们不淡定了，创业者也都纷拥而至，知识付费引发了新一轮厮杀。

知识付费战争在三大领域打响

知乎、得到、分答……知识付费领域的大牛们，早已吹响战争号角，并围绕着三个核心点展开了厮杀。

首先，爆款的耕作。

在内容方面，罗振宇的得到口号打的最响，得到容易产生爆款，其将功利和焦虑的心态大大方方地呈现，并能够用一种高完整度的方式，向他们的目标用户售卖一种精神慰藉，让用户感到随时随地都能“得到”些什么，从而增强他们的购买意愿。知乎live在内容生产端也具有较大优势，站内知名用户较多，且相比其他平台重金邀请业界大牛的方式，知乎让大V参与活动的难度相对较低；相对于得到和知乎的精英型爆款，分答则趋于更大众化、更易引起共鸣的实用性内容。

其次，模式的对拼。

目前知识付费有订阅付费、线下讲座、线上课程、文章打赏、付费问答等模式，知乎LIVE的线上分享会内容相对专业，其有原生的大V，在共生关系下能保证这一模式可以持续运转下去。喜马拉雅主打FM的联合出品（PGC）+主播入驻（UGC）的生产模式前景尚好，不过喜马拉雅的大V都属于外部邀请（比如马东、湖畔大学和吴晓波等），而非社区原生，在粉丝管理这个维度上，喜马拉雅对大V的控制力不强；得到，除了和喜马拉雅一样强调个人ip和品牌栏目，更像是现实中的简报和读书会，这是一种更轻的模式。

最后，流量的争夺。

流量的争夺，比的就是平台获取用户信息的难易度和博眼球的能力，在此方面知识大V代言的付费问答平台分答无疑是最无忧无虑的行家，其优势在于可以现成地从原有的社交媒体平台自带粉丝进入这个付费问答系统。所以分答不必像知乎那样辛辛苦苦从200用户一手一脚的垒人气。另外有“国民老公”王思聪把分答话题燃爆，迅速占领新闻头条；回答限时1分钟，再比如利益均摊，付费者可转型为提问者，有可能和回答者共享收益，增加用户的黏性等等都赚足了大众眼球。但不可忽视的是，长此以往分答必须不遗余力地刺激乃至炒作，用以维持粉丝经济的热度，不停地把在各个领域新鲜的有着大量拥趸者的答主拼命包装。

显然这些平台的运营模式各有利弊，说将来哪一方会一马当先还为时过早，或许微信做一个付费问答把四家都吃了也不无可能。不过大佬们的厮杀是知识时代发展的

必然，我们要看到的是对于想要获取知识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知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唾手可得；但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知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泛滥冗余。

如同前段时间火热的短视频浪潮一样，知识经济时代造就了无数的知识网红大V，但是其中也不乏有很多“造星”出身和营销炒作类的水货。

一些所谓大v们其实不过是知识的“盗窃者”

在这一波知识红利的浪潮中，很多平台热门大V们号称深耕专业领域十几年，成功故事光辉闪闪，为了深化自己的内容价值，表面上对消费者扮演着内容方面的行业资深人，私底下却对知识进行可耻的偷窃和搬运，而这种基于互联网变革下的知识供给，让很多真正有内容价值的知识工作者得以埋没。

当下的知识付费，很多时候只是披着知识外衣的粉丝经济。“60天学习，让你成为天才”、“急速提升课程，半年轻松撩老外”，迅速见效；附赠导师点评和社群互动，进了社群还能积攒人脉，简直买一送三。所谓知识，不过充当了和偶像之间深度交流的一种媒介而已。

而对于推动知识经济兴起的“小白中”，从细分市场在线培训到付费社群，很多知识分享平台利用你们“自己思考不但浪费时间还可能犯错，于是跟着各路大哥直奔高潮的求快抄捷径”的心理进行收割，这时候的你学习了二手知识，为内容创业者变现。

知识付费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坑很多，但应到看到，这波红利的滋生对社会是一个良好预告：知识价值正在回归，在各大平台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知识付费商业模式正在成熟，未来知识付费会具备更多的想象空间。

盗得走知识盗不走行业价值，未来知识付费终将朝着更好的方向进化。人们对深度知识越来越渴求，同时却希望深度知识越来越浅显易懂，而在付费模式上面，可以看到未来知识付费正在迎来两大方向的变革。

其一，媒体业务、内容业务、教育业务三大板块将融合。在人们完全形成知识付费的习惯后，用户会慢慢的沉淀并变成知识消费社群。而知识社群的导向，可以是电商、可以是线下活动，可以是广告变现，但净值最高的变现一定是培训或者出版，因为知识付费维度太单一了，没有粘性，又是非标准品，因此一定会向着标准化程度高的行业发展，未来或催生集媒体、内容和教育培训为一体的行业。

其二，结合AI，知识付费将走向定制化道路。未来AI和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得以结合后，丰富的信息载体和互联网创新技术会将用户的个性化知识需求与各行业的专家大牛以订制的形式连接在一起，实现“用传媒的方式赚教育的钱”，完成一次新的颠覆，甚至可以说“知识工作的自动化”几乎就是知识付费或者说是未来人类的方向。

总的来说，知识付费成为风口，预示着知识价值正在回归，无论对于生产者、消费者还是创业者，这都是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知识付费不同于出行或外卖行业“高频+刚需”的应用场景，知识交易的频率相对较低，但是个性化程度非常高，未来的竞争也许会很残酷，但用户是跟着内容走的，未来谁能时刻把握内容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先机。

大城市限制人口规模就能解决问题吗？

台湾 中评网 2017年5月7日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去年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明确了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提出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一般认为设置人口红线是基于解决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

中国网发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文章表示，近几年来，一些人把大城市中的很多问题归结为“人太多”导致的，比如交通拥挤和污染，以及高房价和资源紧张，并进而提出应该限制城市人口。不少大城市设立了人口规划目标，一般都是设置上限，并努力通过行政措施力争实现这些人口控制目标。

这种限制需求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降低城市活力、效率和人民的幸福感。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和政府增加供给，调整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手段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文章分析，第一，现在城市中的很多问题不是人口过多导致的，而是规划和管理没有适应需求导致的。

数据分析发现，在发达国家，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人均碳排放越小，因为大家居住的地方离工作地点比较接近，人们出行不需要过多开车，而且可以借助公共交通服务。但如果消费和教育集中在市中心，而市中心的居民区又比较少，人们不得不到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居住，人们就不得不开车去购物，开车送孩子上学。已有分析发现暑假期间（人们不用开车送孩子上学）交通拥堵情况变少了，人均的可吸入颗粒物下降了每立方米20微克。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缩短居住距离而解决拥堵和污染的问题。

另外，相比于东京，北京上海的建成区面积偏小，地铁网覆盖范围和密度也远远不够。这也是北京上海比东京人口少但更觉得拥堵的重要原因。

第二，行政性的限制人口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

从理论角度来讲，几乎没有办法测算出一个城市应该容纳多少人口。因为城市的承载力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技术等因素的变化动态增长

的。比如，很多人认为水资源的限制是制约北京承载大量人口的一个因素，而事实上2001年以来北京总人口几乎翻了一倍，但是北京总用水量是下降的。为什么？第一，规模经济导致人均用水量下降；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减少了工业的产值比重，而工业用水是大户，水的用量就下来了。而且，水是可以运输的，并且只要这种运输带来的好处大于它的成本这种方案就是可行的。洛杉矶的水80%都是从外面运输的。我们不能简单考虑北京自身有多少水资源来决定北京能够容纳多少人口。

而从实践角度来说，当我们限制一个城市的人口时就必须决定谁能够待在这里，谁不能够待在这里。这意味着我们要把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就涉及到公平的问题。这其实是让那些被管制的人承担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成本，而那些继续生活在城市的人，享受城市规模经济的效益。

第三，政府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如户籍管制会导致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降低。

用户籍和公共服务覆盖缺失来限制低端人口，经常导致大城市低端劳动力供给不足。实际上，大城市高端劳动力与低端劳动力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比如说比尔·盖茨来到一个城市，他的保姆也得跟着来，而供给不足导致低端劳动力价格上升，最终导致高端劳动力的生产率下降。也就是说如果保姆进入大城市被限制的话，就会导致雇保姆的价格上升，人们雇不起保姆就不得不自己带孩子，做家务，这意味着人们投入生产的时间和精力少了，劳动生产率就下降了。

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制度等都是高度关联，没有大城市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因为考虑到未来收入的下降等因素会减少消费，进而导致该城市中从事消费行业的人员工资降低。已有的研究表明一个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会比有城镇户籍的人消费低14%-20%，越大的城市越明显。而且一个城市里面外来人口往老家汇钱汇的越多，这个现在生活的城市从事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就会越低。这意味着户籍等限制人口政策导致行业发展扭曲。

第四，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调节每个人的选择，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负外部性，增加正外部性发挥作用，促进城市发展。

短期中，当一个城市的资源和环境容纳的约束给定以后，就会有一个价格机制调节人们的选择。供给给定时，需求不断增加会导致价格增加，这意味着人们进入大城市的成本不断增加，大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减小。

长期来看，价格增长意味着供给方的利润空间不断变大，这就引导着供给方不断增加自己的供给，直到它的供给在边际上回报为零为止，这时供给和需求达到了长期的平衡点。

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可以做并且正在做的事情是改变外部性。而政府在增加正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的同时也在动态的增加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技术管理手段增加供应，就像上海以前用自己本地的火力发电场，上海夏天的用电非

常紧张。

最近这些年上海用电不紧张了，因为现在的用电是通过西电东输，现在上海的本地火电厂已经产能过剩，火电厂不发电以后排污也减少了。在这个过程中，电力资源对人口的限制就大大缩小了。这表明政府事实上可以帮城市做大而不是做小，并且更有效率。

第五，大城市更大、小城市更小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整体福利。

国际经验和已有的理论基础表明，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的人口会是第二大城市的两倍，之后城市规模随着大小顺序递减。通过限制人口让所有地区在人口数量上“均衡”是没有效率的。

一方面，如上文所说，在大城市把低技能劳动力排除在城市外，事实上对高技能劳动力是没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一些希望推动城市“均衡”发展的转移支付的政策会导致资源的错配。比如中国2003年之后在西部建设很多工业园区，事实上，现在这些工业园区很多都是空的。这就意味着，政府越是转移支付，劳动力流入大城市的机会成本越高，这些劳动人员在大城市的工资也就相应的提高，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而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园区在长期中也会导致负债的增加。

文章最后说，政府在城市管理中应该更多考虑依赖市场自发决定，而自身只是服务市场需求，解决存在的正外部性不足或负外部性问题。政府在控制大城市过程中的人口规模目标设定是没有太多道理的。

综合治理

净化政治生态要抓住“关键少数”

《香港日报》2017年4月17日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以来，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引发多方面思考。文艺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

“汉东这潭水真深啊！”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反贪局局长侯亮平一句话，道出了对当地混乱政治生态的无尽感慨。

艺术是现实的反映。日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崇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此前，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等4名省委常委也因严重违纪相继落马。班子出问题，“班长”难辞其咎。河北政坛的这场“地震”，再次以“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的现实案例警示人们：领导干部是一方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其身不正，风气必坏。

从不少已查处的案例看，某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有权就任性”，把自己所

在地方和分管领域当作“独立王国”“私人领地”，罔顾党纪国法恣意妄为，成为“毒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污染源”。比如，苏荣在江西任省委书记时，就大搞“小圈子”，大肆卖官鬻爵，不仅自身腐、全家腐，更带坏了干部队伍，给当地政治生态造成巨大损害，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干部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规矩讲面子，“不琢磨事、尽琢磨人”的官迷、“官油子”就会投其所好、投怀送抱，“圈子文化”等所谓的“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净化政治生态，要害还在“关键少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政风之所以气象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强大势能。

自然生态的修复需要长期过程，净化政治生态也非一日之功。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我做起、勇于担当，做净化政治生态的“领头羊”。

近年来，党中央一再要求领导干部严格自律，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为的是增强其自身免疫力，为各级干部立好标、打好样；要求领导干部履行好主体责任，敢于立“明规矩”、破“潜规则”，为的是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让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明起来，让正确用人导向树立起来，从而发挥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关键作用，不断推动政治生态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00多人。仅2016年，纪检监察机关就处分省部级干部76人、厅局级干部2700余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老百姓纷纷点赞的正风反腐成绩单，道出了人心所向，也警示着为政之道：越是位高权重，越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永葆本色，也才能在一方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中国监管层治理金融乱象难游刃有余

英国 路透社 2017年5月13日

中国银监会整治乱象威力尽显，然市场波动加剧和局部流动性骤然紧张也令人心跳。在既要高压态势以实现政策目标，又要把握力度防止过度冲击的双重压力下，银监会也难做到游刃有余。

继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初期便以疾风骤雨式下发监管“套餐”开展全行业风险摸底检查后，银监会本周再度开展特急调研，包括如何防范期限错配投非标、信贷资金绕道资管计划进入股市，以及债券投资、委外业务风险防范等，或为是轮行业整肃

行动中可能暴露的风险问题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银监会）压力也很大，去杠杆这项任务没法迟疑没法犹豫，他们对机构强问责，市场情绪太大可能反过来绑架政策，可如果在监管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监管失误，上头对他们也是责任问责，你说怎么办？难干啊。”一位接近监管层的权威人士称。

该权威人士并指出，银监会开展特急调研不同于此前系列检查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对近期银行业自查和监管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前做一个防风险意见收集，以防可能出现的风险案件的应急处置。

实际上，是次特急调研在4月下旬召开的银监会一季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已有清晰信号，调研内容在业界看来大体上还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对比“三三四”这类检查而言明显温和不少。

“监管也是煞费苦心了。”有城商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表示，一方面，银行自查很有“学问”，意味着现在所有降杠杆措施都是银行主动，不是银监会逼迫，将查到的问题限期整改，这无形当中给了缓冲期；二是特急调研，“老问题不搞检查而是调研，一来说明发现问题比较多，二来监管除了查问题也要提前做好方案处理问题，避免检查过程中的突发事件造成市场大波动。”

的确，不管是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还是民生银行的“假理财”案件，都是各种金融乱象的局部反应。路透周五报导，是次特急调研还包括如何防范“萝卜章”风险事件等开展调研，如何防止股东关联贷款风险；如何控制关系人贷款风险，如何防范员工私售“飞单”行为等，要求银行提供报告及建议。

郭树清在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指出，金融乱象与案件风险暴露相互交织，总体风险形势仍然复杂严峻。要大力整治金融乱象，全面排查，列出清单，逐一整改。

控制杠杆率无疑有利于金融体系健康，但短期而言，特别是如果各监管部门协调不畅很可能引发更多信用事件，增加市场波动，这在近期的金融市场已经有所体现。监管层保持必要压力是肯定的，但当前更需要进一步把握监管力度，防止对市场造成过大压力。

多位接受路透采访的银行业人士均表示，当前面临央行和银监会的双重监管压力，赞同去杠杆但要逐步去，当前整个金融同业市场的特点如果强硬去杠杆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法预料的问题，不能让市场死掉，毕竟流动性危机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初期表现形式。

“年初以来央行已经市场化在去杠杆了，价格提上来已经形成倒逼压力，现在行政上银监又来查，两头来挤。”前述城商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称。

消息人士透露，深圳银监局日前对辖内中资法人银行流动性管理现状展开调研，

了解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和机制，流动性风险支持情况以及最近一起压力测试报告等内容，以分析当前影响流动性管理的关键因素，提高对流动性管理的监管水平。

监管层对政策影响的预期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往往存在偏差，稳定预期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同样重要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加强自身流动性管理，摒弃市场略有波动就是系统性风险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思维。

有农商行金融同业部总经理就表示，今年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流动性风险，为此还对内部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将原来属于金融同业部的资金交易团队划归直属总部管理，加强流动性管理，“相当于是一个大资金的概念，一个考虑是不希望他们有部门利益的因素，有一个全局观，也让他们对整个部门的资产配置有所了解，可以统筹安排资金。”

环球视野

美挑起减税战扰乱全球经济

香港《大公报》2017年4月28日

为了展示执政百日的政绩以及挽回下滑中的民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号称史上最大规模减税计划，将会惠及企业与个人，其中最受关注的企业所得税率，建议从百分之三十五大幅降低至百分之十五，比香港的百分之十六点五税率还要低，美国此举如同挑起一场减税战，触发全球财税政策竞争，对于复苏基础不稳的世界经济而言，无疑进一步添加不确定与不稳定风险。

美国税制改革内容重点在于大幅减税，期望刺激企业投资与个人消费，以提振增长动力不足的经济，目标为经济增幅在百分之三以上，奈何这如意算盘存在很大变数，不仅需要国会通过，而且大幅减税带来严重副作用，包括加剧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通胀急升及加息步伐提速，美国随时得不偿失，由此更有可能刺破美股、美债泡沫，引发新一波金融震荡，继而祸及全球。

税改是特朗普执政百日的重头戏，但税改方案却欠缺具体细节，例如大降企业所得税是否一步到位抑或是分阶段下调。同时，为了吸引企业将存放在海外的数万亿美元利润资金调回美国投资，税改方案建议仅需一次性征税，但相关税率却未有定案。显而易见，特朗普深知这次减税计划影响广泛，且具有争议性，不容易争取国会通过，特意留有弹性空间，随时作出修改。

事实上，特朗普提出大幅减税计划，对美国以至世界经济将带来三大风险。

一、引发全球减税战，造成世界经济形势纷乱。美国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势必引起全球反弹，各国为保持税项竞争力，预期亦步亦趋，与美国斗减税，情况一如货币战与贸易战。事实上，英国早已表明减税，以纾解脱欧对经济冲击。全球正刮起竞争性减税之风，世界经济将陷入更加纷乱局面。一旦减税战全面爆发，全球都是输

家，根本没有赢家。

二、财税政策竞争加剧，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恐升级。金融海啸至今九年，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呈现低速增长困局，宽松货币政策已走到了尽头，全球正转向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包括透过减税刺激经济，罔顾财赤与债务上升，忧心全球债务急剧恶化，主权债务危机升级。事实上，美国大幅减税的同时，未有提出具体开源的计划，估计未来十年税收缩减二万亿美元，已达到二十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债务或迟或早爆煲。

三、减税推高通胀，加息速度将超预期。如果美国落实大幅减税，将带动通胀急升，加息步伐将比预期更加急劲，以致美元汇价显著走强，环球金融市场面临新一波震荡。

其实，美国减税吸引企业投资、振兴经济效用成疑，企业作出产业投资决定，税项并非主要考虑因素，生产成本与回报率等因素更为重要，特朗普一厢情愿抛出这个减税方案，最终可能徒劳无功。

环绕世界的“一带一路”战略

汤姆·汉考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5月9日

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港口到东非的高速铁路，再到穿越中亚的天然气管道，中国计划投资9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One Road, One Belt）倡议称得上是历史上由单个国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动。

拥护者称，一带一路倡议——由对国内增长放缓的担忧以及对扩大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渴望所驱动——有望帮助填补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缺口。它还可以助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同时提振贸易并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带着以修建基础设施促进贸易的初衷，一带一路计划将沿两条路线展开：一条大致沿古丝绸之路（Silk Road），从中国经由中亚和中东直至欧洲；另一条通过海路连接中国到东南亚和非洲东部。

随着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和国内基建支出——变得不如以往稳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正式宣布了一带一路倡议。西方经济体增长陷入停滞，而由于房地产、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在中国国内投资的回报率迅速下滑。

与此同时，中国政策制定者正设法在边疆地区（一直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提振经济增长，他们希望本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比所持的660亿美元美国国债带来更高回报。

既然主要动机是为了寻求国内经济增长，那一带一路归根结底只是“一项具有地缘战略影响的国内政策，而非外交政策”，研究过这一倡议的欧盟前驻华外交官查尔

斯·帕顿(Charles Parton)说。

一带一路延续了北京方面的一项努力，即帮助国内企业——从高铁制造商到电信公司——积累经验，打造国际品牌。“他们认为，下一步要让中国企业具有全球竞争力，学习管理技术等……做强这些冠军企业（中国所希望做的）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部分，”帕顿补充说。

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的标签已经扩大到涵盖远至新西兰、英国甚至北极地区的一些项目。中国已列出了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在这些国家开发数百个带有一带一路印记的项目。

其中的核心项目包括一条投资540亿美元、连接中国新疆地区与巴基斯坦深水港瓜达尔港(Gwadar)的陆路通道。中方将投资11亿美元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建造一座“港口城市”。规划中的一条长3000公里（1900英里）、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新加坡的高铁线耗资将更多。

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波筹资和机构建设热潮。2014年，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宣布成立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2015年，中国携手其他国家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该行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预计主要将用于一带一路国家。同年，中国为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向3家国有银行拨款820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变得无所不包是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推波助澜，因为他们急于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十年来中国最具权势的领导人。在中国，“如果你希望一个项目或计划获批，你就说它是一带一路项目，结果是，所有项目都成了一带一路项目，”帕顿说。

一些乐观人士认为，基于中国国内几十年来依靠基建驱动增长的经验，一带一路倡议将成果丰硕。“一带一路正在做的是中国最擅长做的——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简·格利(Jane Golley)说，“作为一项经济战略，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望获得成功。”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外交政策变得日益强硬，一带一路也是地缘政治上的一步迂回棋。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并未被列入一带一路国家，让人联想起军事战略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所称的“地缘经济学”——遵循“商业法则”的“冲突逻辑”。“这是一项重大长期地缘经济战略，有可能将改变全球经济的重心，”格利补充说。

令中国境内外观察人士担忧的是，由于许多规划项目（包括处于饱受腐败和不稳定困扰的地区）带有地缘政治色彩，一带一路计划可能只会加重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负担，后者如今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0%。“一带一路项目背后商业逻辑的缺失意味着，未来项目回报是否足以完全清偿中国债权人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评级机构惠誉(Fitch)今年1月表示。

例如，中巴走廊要穿过动荡的部落地区，而瓜达尔港处于叛乱分子几十年来与政府军争夺的地区的中心，迫使伊斯兰堡承诺用一支由1.2万名士兵组成的特种部队保护该走廊建设。

位于中东的众多项目意味着，中国将日益被卷入该地区的政治动荡。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境外的项目鲜有已经完成的。例如，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霍尔果斯(Khorgos)“无水港”计划将打造货物从中国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枢纽。中国计划投资6亿美元，建设包含批发市场、铁路线和货运起重机的大型综合设施。尽管中国边境一侧环绕着新建的高楼，但哈萨克斯坦一边只有几座半废弃的建筑。与泰国的高铁谈判也陷入停滞。据官方媒体报道，明显缓慢的项目进展促使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6年8月呼吁“实施好一批示范性项目，多搞一点早期收获，让有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对于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扩大海外政治影响力的一种工具的担忧，也可能引发反弹。上月，澳大利亚正式拒绝接受该倡议——此前，澳大利亚的盟友美国也明确与之保持距离。（但新西兰没有表示拒绝。）“虽然日益得到其他方面的认同，但（北京方面）必须克服政治雷区，”北京咨询机构齐纳百思(China Policy)研究主管戴维·凯利(David Kelly)说。

中国已经从早前一轮海外投资潮（即“走出去”政策）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当时中国国有企业疯狂收购全球资源，导致大量溢价购入资产，随后遭遇资产减记，还招致了一些国家的不满，后者认为这些资源开采协议有失公允。

“今后驱动因素将是投资回报，”凯利说，中资银行已从国企手中夺过这些项目的部分支配权。强调一带一路对世界各地企业都“开放”的中国政府也正在淡化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的存在”，他补充说。

这或将给西方公司带来机会。中法合作在英国建设的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电项目也被中国官员也列为一带一路项目。英中贸易协会(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在一份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告中表示：“我们相信，英国企业将有实实在在的机会与中国伙伴在第三国进行合作。”西门子(Siemens)从一家中国国企获得了在沙特阿拉伯建设一座电厂、价值10亿美元的订单，而通用电气(GE)表示，该公司正在瞄准一带一路中数十亿美元的项目。

目前北京方面全无放弃一带一路计划的迹象。席卷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就是一个体现——更是带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将一带一路计划描述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工具，习近平今年1月在达沃斯发表演讲时已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

“如今，一带一路已被视为中国为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凯利说，“问题在于，中国挺身而出扮演这一角色要付出什么

代价。如果他们走到这一步，代价肯定不小。”

学术前沿

美挑起减税战扰乱全球经济

香港《大公报》2017年4月28日

为了展示执政百日的政绩以及挽回下滑中的民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号称史上最大规模减税计划，将会惠及企业与个人，其中最受关注的企业所得税率，建议从百分之三十五大幅降低至百分之十五，比香港的百分之十六点五税率还要低，美国此举如同挑起一场减税战，触发全球财税政策竞争，对于复苏基础不稳的世界经济而言，无疑进一步添加不确定与不稳定风险。

美国税制改革内容重点在于大幅减税，期望刺激企业投资与个人消费，以提振增长动力不足的经济，目标为经济增幅在百分之三以上，奈何这如意算盘存在很大变数，不仅需要国会通过，而且大幅减税带来严重副作用，包括加剧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通胀急升及加息步伐提速，美国随时得不偿失，由此更有可能刺破美股、美债泡沫，引发新一波金融震荡，继而祸及全球。

税改是特朗普执政百日的重头戏，但税改方案却欠缺具体细节，例如大降企业所得税是否一步到位抑或是分阶段下调。同时，为了吸引企业将存放在海外的数万亿美元利润资金调回美国投资，税改方案建议仅需一次性征税，但相关税率却未有定案。显而易见，特朗普深知这次减税计划影响广泛，且具有争议性，不容易争取国会通过，特意留有弹性空间，随时作出修改。

事实上，特朗普提出大幅减税计划，对美国以至世界经济将带来三大风险。

一、引发全球减税战，造成世界经济形势纷乱。美国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势必引起全球反弹，各国为保持税项竞争力，预期亦步亦趋，与美国斗减税，情况一如货币战与贸易战。事实上，英国早已表明减税，以纾解脱欧对经济冲击。全球正刮起竞争性减税之风，世界经济将陷入更加纷乱局面。一旦减税战全面爆发，全球都是输家，根本没有赢家。

二、财税政策竞争加剧，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恐升级。金融海啸至今九年，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呈现低速增长困局，宽松货币政策已走到了尽头，全球正转向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包括透过减税刺激经济，罔顾财赤与债务上升，忧心全球债务急剧恶化，主权债务危机升级。事实上，美国大幅减税的同时，未有提出具体开源的计划，估计未来十年税收缩减二万亿美元，已达到二十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债务或迟或早爆煲。

三、减税推高通胀，加息速度将超预期。如果美国落实大幅减税，将带动通胀急升，加息步伐将比预期更加急劲，以致美元汇价显著走强，环球金融市场面临新一波

震荡。

其实，美国减税吸引企业投资、振兴经济效用成疑，企业作出产业投资决定，税项并非主要考虑因素，生产成本与回报率等因素更为重要，特朗普一厢情愿抛出这个减税方案，最终可能徒劳无功。

专家热议“一带一路”峰会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中国北京举行。峰会论坛有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出席。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是2017年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论坛将带来巨大机遇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玄定泽**：“一带一路”倡议是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的重大举措，此次高峰论坛将为韩国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中韩两国已将“一带一路”与“欧亚倡议”合理对接，并缔结了合作备忘录，这为进一步扩大了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开发、能源、IT通讯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由韩国企业出资12亿人民币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珲春国际物流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此可见，两国政府在物流方面的具体合作计划已被提上了议程。（人民网 2017年5月15日）

峰会推进六个空间的互联互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翟崑**：在日前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把“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实现联动发展”作为重要议题，各方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达成14项合作举措，令“一带一路”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具体而言，可以理解为这次峰会推进了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在六个空间维度上的互联互通和对接。首先是促进周边市场空间和制度空间的对接，公报“主张加强各国基础设施联通、规制衔接和人员往来”，甚至在合作举措中具体提到了“通过借鉴相关国际标准、必要时统一规则体制和技术标准等手段，实现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协同效应最大化”。其次是促进周边和全球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接。“一带一路”不仅将沿途乃至世界的海陆空天的实体空间连接起来，也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把虚拟世界和基础设施等连接起来。当今的全球化中有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最后是促进周边文明空间与心理空间的衔接。公报提出“鼓励不同文明间对话和文化交流”，“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纽带，深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智库、媒体以及包括实习培训在内的能力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文明空间更强调整体性，而“一带一路”沿线共生多种文明，多种文明

的和谐共处，化敌为友，是人类共同梦想。（央视网 2017年5月18日）

一带一路有助于改善全球治理体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林**：“一带一路”是建立在互惠互利和公平开放基础上的，“一带一路”的实施将有助于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经济发展同许多国家发展高度契合。中国帮助其合作伙伴建设了多种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深化了经济联系，促进了贸易增长，遏制了保护主义抬头。他表示，“一带一路”不仅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开发，中国还打算促进合作伙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制订“一带一路”框架下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发展科学技术交流，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科技园区等。（新华社 2017年5月22日）

会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发展“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能促进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融合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迈向更高水平，应大力推进。服务贸易合作，不仅可以支撑货物贸易和投资合作，还可以促进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服贸相比，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服贸合作，可以在服务业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获得更高的国际分工和服务贸易收益。在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时，要注意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向基础设施运营维护服务升级；科教文卫体等人文交流要更加注重商业化、市场化和企业参与度，向服务贸易互利合作升级；在发展旅游、建筑、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的同时，更加注重向互联网、信息技术、智慧城市等新型服务贸易创新合作升级；并且建立“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大数据平台等。（新华社 2017年5月17日）

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性的合作倡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的除了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还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这说明“一带一路”不仅超越了古丝绸之路所涵盖地区，而且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正在不断扩展，变成了全球层面的合作倡议和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是高度开放的全球互联互通的倡议，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都将从中受益，希望更多的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把倡议变成合作机制；二是把以往以双边为主的合作变成多边合作；三是把共识变成围绕具体项目的合作。（新华网 2017年5月12日）

中国方案晋升为国际方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主持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并致辞，为会议定下基调。论坛发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成果清单》。成果清单显示，与会各方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的具体成果。这标志着“中国方案”已晋升为“国际方案”，为中国“圈粉”无数。中国方案实现如此华丽的转身，源于得道多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率先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与共鸣。“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21世纪“凿空之旅”，是世界最浩大的超级工程，其中“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与“五路”（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承载着中国与世界共同的和平发展梦想。（中国经济网 2017年5月17日）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带来五个“新”变化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可以用五个“新”概括习总书记峰会讲话精神：第一个“新”，是发展理念达到“新境界”，习近平主席在全球视野中谋划开放大格局，在开放格局中谋划世界大发展，是对“一带一路”包容发展理念的新诠释，对合作共赢理念的新演绎；第二个“新”，是开放发展的“新实践”，中国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主动引领全球经济合作；三是经济增长的“新方略”，“一带一路”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新动能，是扭转中国区域发展失衡的新契机；四是共同繁荣的“新起点”，“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化更均衡包容的新载体，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尝试；五是人类文明的“新贡献”。丝绸之路，首先是贸易之路。扩大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一带一路”在全球贸易下滑的大趋势下，持续向世界释放发展正能量，有力带动了沿线国家实现贸易优化升级。（海外网 2017年5月24日）

信息快递

经济是否触底回升取决于新旧产业更替 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5月5日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一季度所取得的成绩用L型走势中的小周期复苏来形容更为准确。黄益平强调，过去有竞争力的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产业，现在都失去了竞争力。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只有推动产业结构改变，才能真正稳住增长下行的态势。黄益平认为，中国现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下行压力依然存在。而且当政府稳增长力度加大的时候，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就会放慢。毕竟传统支持增长的办法更多地是往传统产业使力，尤其是基础设施，当中包括房地产。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说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了或者经济增长如此加速，还是需要谨慎些。真正的触底回升，最后要取决于旧的产业是否淘汰以及新的产业是否形成，进而支持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全球掀减税潮中国税改需提速 澳门《澳门日报》5月2日报道，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认为，美国税改将可能导致主要经济体在全球竞争力的重塑，中国的减税措施除了营改增以外，尚未涉及税制的实质性改革，中国或许有必要在税制改革方面加大力度，以避免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失去先机。年初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回暖、企业活力增强，与近几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不无关系。但相较于美国的减税计划，中国目前的税改力度和幅度仍然不足。会计师税务所德勤中国副主席张宝云说，中国在提升税务的可预见性与一致性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完善对税务官员的培训以及加强税务政策的公众咨询。中国的税制更新和现代化，将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首届PPP项目落地增28% 香港“阿斯达克财经网”5月5日报道，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2017年PPP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称，今年第一季度仍然保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落地加快的良好态势，落地项目增长28%。史耀斌表示，2017年重点是要健全PPP制度体系，大力推动农业和幸福产业PPP发展，规范推出第四批示范项目，加大PPP以奖代补资金和PPP基金引导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推动PPP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他认为，三年多来PPP改革推进去了积极成效。特别是2016年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落地PPP项目数量和规模较2015年增长4倍多，覆盖地区及行业进一步扩大，民企参与度稳步提升，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同时将力争在项目落地率、民企参与率和规范运作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中国建成九大石油储备基地 香港《东方日报》5月3日报道，中国官方公布已在浙江、山东、辽宁、天津、甘肃以及新疆等地，建成九个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共储备3325万吨原油，较前年大增近三成。有关分析指出，中国持续兴建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是要增强应对进口石油遭中断风险的能力，但目前存量还未达90天战略储备的安全线，因此将争取在四年内建成百日石油净进出口量的储备总规模。上述九个储备基地，储备库容达到500万立方米或以上的基地有四个，包括浙江舟山、镇海和天津及新疆独山子石油储备基地；库容达到300万立方米的则有山东黄岛、黄岛洞库、甘肃兰州、辽宁大连，而舟山扩建石油储备基地库容亦有250万立方米。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石油储备中长期规划》，2020年以前，中国将陆续建设国家石油储备第二期、第三期项目，形容相当于百日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总规模。

气候变迁使全球城市面临挑战 法国“法新社”5月4日报道，欧洲地球科学联盟科学家警告，面对全世界人口膨胀及持续升温，城市必须尽快加强防范气候变迁引发的

洪水和高温。城市温度预料在接下来几年内急升，让居民暴露在致命高温里，同时海平面上升和河水泛滥将威胁住房、饮水和交通及电力基础设施安全。科学家指出，城市易于遭受被称为热岛效应，因为城市混凝土表面较未开发地区保留更多的太阳热能。有关研究报告指出，欧洲城市将经常性遭遇热浪，欧洲南部数量较多，北部则较为密集。有关研究人员表示，水患频繁的东南亚，本世纪降雨将提高20%。由于都市区域预料将扩大，而都市区域往往没有足够能力应付大自然的危机，风险尤其高。

2017年中国零售业呈现七大发展趋势 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5月1日报道，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称，2016年中国消费品市场呈现新消费、新零售和新生态特征，2016年中国消费品市场同比增长10.4%。而2017年中国零售业发展将呈现七大趋势，主要表现在消费者消费心理将更加成熟、零售业将加快适应市场变化、科技与时尚生活方式相融合、高质量商品服务与文化相融合、线上和线下进一步融合、多种业态将呈现聚合式生态化发展、零售业社交化特更加明显。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预测称，中国消费者将进一步减少模仿式消费行为，取而代之的是满足个人真实需求的消费。

版权产业成发展新引擎 香港《文汇报》5月1日报道，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2015年中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报告指出，2006年至2015年中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从13489.33亿元人民币增长到50054.14亿元，翻了近两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从6.39%提高至7.3%。从增速上看，中国版权产业行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说，十年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3.49%，而同期中国版权产业行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68%，高于GDP增速2.19%。特别是中国版权产业行业中的核心版权产业发展迅速，2006年至201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8.68%，高于GDP增速5.19%。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85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7年6月28日